

Helen Foster Snow



RETURN TO CHINA

重返中国

海伦·福斯特·斯诺 著

重返中國

黃華題

海倫·福斯特·斯諾 著

劉炳章 王中一 隋麗君

盧佩文 王培清 房志平

譯

《重返中国》

海伦·福斯特·斯诺著

*

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金果胡同8号)

邮政编码：100035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胶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25印张 330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80087-052-9/K·1

登记证号：(京)070 定价：12.50元

《国际友人丛书》总序

在我国首都和地方一些中外文出版社的共同倡议下，《国际友人丛书》即将陆续出版问世。这是我国出版界为更多地介绍国际友人而做出的尝试，也是很有意义的一次创举。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翻开中国近代史，在各个时期里都有大批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进步事业。他们有的不顾个人安危，直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有的冒着风险，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有的渴求真理，公正地介绍中国实况，赢得了国际上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有的呕心沥血，忘我无私，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中国人民。新中国成立以来，又有大批友人为中国的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而勤奋工作，奉献才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有的甚至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像灿烂的群星，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闪烁着永恒的光辉。

他们是各国伟大人民的优秀儿女和卓越代表。虽然在国籍、肤色、语言、专业上各不相同，也各因不同处境而与我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同情和爱戴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能为此做出贡献而感到光荣。中国人民因有这么众多的国际友人而自

豪。他们的深情厚谊和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像雨露和阳光，使我们从中汲取着前进的力量。

在这些国际友人中，不少人留有自己的著作，包括自传、日记、书信等；也有中外作家、学者、亲朋好友所写的关于他们的传记或回忆。这些著作大都记载了他们个人在中国的经历和生动感人的事迹；体现着他们的高尚品质和情操；反映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切情谊和期望；同时也记录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以及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寻求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的道路上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业绩。其中有些已被世界公认是了解中国近代史必读的名著。无疑，这是国际友人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这些著作曾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三四十年代，大批中国青年是在阅读了其中一些著作后而走上民族解放和革命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后，这些著作又激励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然而，这些著作中，有的因年久而已失传或绝版；还有不少著作尚未翻译出版，为中国广大读者所不晓；许多国际友人未留有著作。但关于他们的事迹却流传不少；尤其是那些如今健在而已年近古稀的国际友人，他们仍保有不少资料急待加以整理。因此，发掘整理这些资料，编辑出版这些著作，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抱着这种责任感和紧迫感，由各有关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副总编和一些中外专家组成了《国际友人丛书》编辑委员会，其目的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这套丛书将以国际友人的传记为主，也包括他们的一些代表性著作；除中文版外，还出版一些外文原著。我

希望编委会经常同作者、译者、中外朋友和广大读者们保持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便能够集思广益，发掘选题，确定书目，保证出书质量，向中外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介绍国际友人的著作。

今天，全国人民正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发前进。编辑出版国际友人的著作，介绍他们的光辉事迹，发扬他们的高尚品质和献身精神，不仅对国际友人是种纪念和慰藉，对国外广大朋友是种鼓舞，而且对于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更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我相信，当我国青年一代读到国际友人这般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事迹时，一定会激发出更加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情，更加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当读到这些著作中关于中国革命艰苦而光荣的历程时，一定会更加珍惜中国革命前辈用生命和血汗创造的业绩，更加发挥艰苦奋斗、勤劳创业的革命传统；而国际友人的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更会启发我们青年一代广开眼界，培育高尚情操，树立远大理想，把自己同可爱的祖国和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

我想，《国际友人丛书》的出版，也是为了表达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无限感激和永恒的思念。没有这些国际友人的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难以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

祝愿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永放光芒！祝愿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黄 华

编者的话

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1907年9月21日生于美国犹他州一个律师家庭，是当代美国著名女记者、女作家，也是大家熟悉的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

她于1931年第一次来中国时，年仅24岁，年轻美貌，才华出众。她先出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社交秘书，不久后为《密勒氏评论报》工作。1932年她与埃德加·斯诺结婚。

“一二·九”运动时，她正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和埃德加·斯诺积极支持并热情地报道了这一爱国学生运动，并与学生领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6年她在西安采访了张学良将军，第一个向外界传递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信息，提前70天预测到西安事变的发生。继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访问保安后，海伦·斯诺也在1937年5月冒着生命危险，摆脱西安军警的监视到了延安。她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34位中共领导人，写出了《中国红区内情》一书（即《续西行漫记》）。这本书和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使世人了解红色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激励了一大批青年人奔赴红区，投身革命。

海伦·斯诺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她

在旅居中国期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她向欧美各大报纸撰稿，报道中国形势和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她和埃德加·斯诺是30年代远东最活跃的两个外国记者。

1938年，她和路易·艾黎等人倡议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后方农村创办工业合作社，发展经济，支援抗日救亡斗争。海伦·斯诺为了“工合”运动，整整奔波了10年，到处募集款项。

海伦·斯诺于1940年12月返回美国。1949年她与埃德加·斯诺离婚。在麦卡锡时代，由于她30年代在中国的活动，遭到政治迫害，失去自由达23年之久。她与美国社会的货币经济格格不入，一个人孤独地居住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一所小农舍里，体弱多病，生活困难。但她始终满怀着对中国的厚爱，认为自己对美中友谊负有自然使命，为了让更多的美国同胞了解中国，她顽强地生活和工作着。

1972年底和1973年初，她克服各种困难（包括身体上的和经济上的困难），重新踏上了中国大地，以65岁的高龄，继续追寻中国革命的足迹，向世界做出新的报道。

这本书，就是她重返中国的结晶。

在书中，海伦·斯诺以旅游札记的笔法，夹叙夹议地为我们展示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个方面的图景，或者说这个时期的中国在一个曾在30年代的旧中国生活过的美国老中国通眼中的图景。虽然她这次在中国所走的地方是有限的，所接触的人是有限的（在基层参观访问时，大多是各级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接待），但她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和智慧，以自己长时间积累的对中国的丰富知识，特别是以30年代在

中国的经历为基础，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解放后的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海伦·斯诺的一些议论，特别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议论，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性，是不全面的，她所持的一些观点也与我们不尽相同。但是，贯穿全书的她的一种精神却是令人敬佩、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这就是她观察和研究问题时的广阔的视野和历史的观点。她是在理解中国漫长而复杂的历史的基础上来理解中国的现在，通过世界范围的比较来判断中国的成就。

她每到一处，都会回忆这个地方在 30 年代是个什么样子；她每和一个人谈话，也都要尽可能地了解这个人过去的经历。她总是在不断的比较中来评判呈现在她眼前的一切。她一再指出：不了解中国旧社会的性质，怎么能了解从中国旧社会产生的这个新社会的性质呢？她说，不能用西方尺码评判中国人，必须根据他们自己的历史和背景来判断。

海伦·斯诺认为，中国是从一个错综复杂的混合制度中出现的，中国把几种革命重叠在一起了。解放前的中国既是原始宗族祭祖制（这是 2000 年前基督教革命的对象），又是“半封建制”（这是清教徒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对象），又是特殊的半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制（这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凭自己的首创精神和个性，从人类社会的所有这些阶段中诞生出来，并在革命运动中加进自己的重要内容，发动文化革命来消灭上述各阶段的残余。

她在访问中感到，在新中国，旧宗教的精华正摆脱礼拜形式，以一种特殊方式发扬光大。社会主义新人具有儒家的讲究礼仪的优雅风范，具有佛教的温和，实行天主教的宽恕、

慈善和认罪方式，同时如清教徒般以艰苦工作为美德，反对铺张浪费。这些特点的混合令人目炫，但尚未具体成形。而旧的文明留下来的则有隐秘性、不信任别人、喜欢正统、官僚政治等。她认为中国尚在改造中。

海伦·斯诺指出：中国在旧社会，个人没有任何机会为自己考虑或在体格上或思想上使自己有所发展。个人遭到家庭、家族和行会制度的束缚。现在，国家帮助发展体育，国家发工资给作家、艺术家。思考自由虽然不多，但人们已无挨饿之虑，且没有吸毒、酗酒。在社会主义下，个人自由大于儒教社会。她认为，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决非易事，甚至不可能。一切条件更便于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要进行的变革要比建立社会主义更巨大得多。

海伦·斯诺“从历史和世界图景中观察中国”的方法在书中的各个细节都能体现出来。她非常注意新中国丧葬制度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中所包含的革命意义，认为这是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与摆脱迷信的程度的可靠尺度。她在同中国艺术家谈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艺术作品所表现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性、阶级性时，她理解“这是历史问题”，欧洲艺术也有很强的革命象征。她一方面坦率地指出：作品也不能太美，歌颂得太多，那太理想化了。艺术的秘诀应是辩证的，应表现对立的方面。同时她也认为，在旧中国，劳动人民比在任何国家都受到轻视，现在给予劳动人民在艺术中的地位，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是把旧的美学观念颠倒过来了。

海伦·斯诺对中国老一辈革命家非常崇敬。她认为中国的老干部是一批了不起的人，属于世界上出现过的最优秀的人物之列。但是中国人很少知道他们的个人生活情况。如果

青年能了解这些老战士的个人情况，他们给青年的实际启发就会大得多。她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充分肯定老一代的优秀品质。她在书中多次谈到，1966年以后长大成人的青年思想单纯得象一张白纸，这种情况很危险，需要加强教育。要让他们知道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更成熟一些。她指出，现在中国的青年人古今历史知识非常贫乏，只学过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指南，“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义不过是分析的指南，需要有材料才能分析”。她担心，年轻人知识这么少怎么能从老一辈手中接班？

海伦·斯诺的另一个可敬之处是她非常忠实于事实，坚持客观报道。为了避免掺杂进自己的思想，她注意不用自己的话去写别人的观点，而是把别人对她谈的话准确地记录下来。所以读这本书时能使人感到很浓的历史气息，重新听到许多文化大革命时期常常听到的语言。当然现在完全不必计较这些干部和工人、农民说的话妥当与否，它毕竟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许多中国人纯朴的思想和感情。此书出版时，对个别段落做了些删节，相信读者会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书中的问题。

郭 琰

1991年9月

序

我的旅行的时间是从 1972 年 11 月 21 日到 1973 年 2 月 10 日。我拍摄了 1000 多张彩色幻灯片，其中一部分由我的代理人纽约市马格努姆摄影有限公司出售。

据我了解，30 年代在中国生活过的美国中国通中只有两人再次去中国，并且写了有关新中国的书。这两个人就是我的已故的前夫埃德加·斯诺（他在 1972 年去世）和我。在 1936—1937 年，我们俩首先去探索中国的共产党实验，并且出版了关于这种实验的书，虽然另外一些人也曾经到那里去过。在 30 年代进行过活动的其他外国人中只有两个新西兰人出版过谈新中国的书，他们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个是路易·艾黎，一个是贝特兰^①（他写了一本供儿童读的书）。

^① 贝特兰，即詹姆斯·芒罗·伯特伦（1911 年—），其实是英国人，不过他曾任新西兰维多利亚学院英文讲师。他在 1937 年 10 月曾秘密去延安访问毛泽东。毛泽东对他发表的谈话已收入《毛泽东选集》。——译注。

经过 30 多年以后，陌生人把我当作一个活着的传奇性人物，读过我写的第一本书《中国红区内情》（1939 年）的人尤其是如此。我听说此书现在在中国被看作权威性著作，是中国出版过的由西方人写的两本最有影响的书（除了教科书以外）中的一本，另一本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国青年认为两个年轻的非共产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写的这两本书作了准确的估计。这两本书由于在重要关头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因而已成为他们时代的历史的一部分。这方面有什么秘密呢？秘密在于我们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没有人写过这样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写过这种书。埃德加·斯诺的这本书已经在全世界成为一部权威著作。

我对中国人说，我想去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都从未去过的地方。路易·艾黎是在中国居住过的人之中足迹最广的一位，在外国人中间肯定是去过地方最多的一位。所以，我的这个要求提出了一个难题。

我一直想去湖南省（埃德加·斯诺从未去过）。那是毛泽东的故乡省份，对他早年的成长发展有很大影响，它也是 1937 年曾在延安对我讲述过自己的生活经历的另外五六位湖南人的故乡。我至今是一位天生爱钻研地理学和研究各种思想的探索者。

我抢到的第一并不太多，因为艾黎已经用了 45 年的时间，把每个角落都寻过了，真是一位马可·波罗式的人物。我作为马可·波罗式的旅行家所创下的一个重要的第一，是我第一个去了浏阳县的文家市。1927 年，“毛泽东主义”就是在那里诞生的，因为那一年毛泽东正是在那里把当时各次农民

起义所剩下的队伍集合在一起（一共只有 1000 名农民，主要武器是红缨枪），然后把他们率领到井冈山上的安全地带。文家市是井冈山所属的那个山脉的一部分。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曾经到过浏阳县。官员们告诉我，就他们所知，我肯定是 1949 年以来去浏阳的第一位外国人（不过这看来是不大可能的。我自己没有去向路易·艾黎核实，怕那样一来会把我自负的资本毁掉）。浏阳从 1925 年起一直不断地陷于内战或实行戒严，所以差不多对任何外国人都关闭，除非 1906 年到 1924 年之间可能是例外。大概从 1924 年起，那里的农民是中国所有各地区中最革命的，那正是毛泽东 1927 年选中它为根据地的原因（他在学生时期曾经在 1917 年徒步旅行到那里）。

中国人提出有几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是艾黎和任何其他外国人从未去过的。就那些博物馆馆长和官员们所知，至少自 1949 年以来他们从未去过。这些地方有：长沙的望麓园和韶山附近的银田公社（毛泽东 1925 年曾在那里建立农民组织，他去长沙也是在那里上小船），还有银田的一座地主庄园，共有 102 个房间。我把这张名单一一查对了一遍，下面是勉强可算是我第一个去过的一些地方（据人家告诉我，这些地方艾黎从未去过）：在长沙，有周南中学（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摇篮）和中国的耶鲁大学（自 1951 年以来没有任何外国人去过），还有一家妇女合作工厂（那里没有“外国人”去过，只有“老挝来的几个人”去过）。在上海，据那里的人告诉我，“除几位日本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以外”，我是 1949 年以来获准去参观以前的国际巡捕房和监狱的第一位“外国人”。我还是把李莉在新四军里的经历写下来的第一人。

还有一桩可能是我第一个做到的事情是，他们告诉我，一般说来，没有任何外国人考察过毛泽东故乡的韶山公社，因为来客只呆一天，没有时间进行考察，而毛泽东的亲戚们接待了我，那里 70% 的人都姓毛。

目 录

序.....	(1)
第一部分 前往中国：昔日与现今.....	(1)
三分之一世纪.....	(2)
11月30日 印度新德里	(11)
12月1日 香港	(26)
12月2日 广州风情	(30)
沙面	(36)
广州市区	(46)
梅县的故事	(54)
12月3日 抵达北京	(59)
第二部分 重返北京	(65)
北京饭店	(66)
12月9日 团聚	(72)
乔冠华和龚氏姐妹	(87)
重返母校——现在的北大	(93)
哲学教授冯友兰.....	(105)

在北京的老中国通·····	(110)
新西兰人艾黎·····	(112)
黎巴嫩人马海德医生·····	(122)
维也纳人魏璐诗·····	(129)
八宝山——优秀共产党员的去处·····	(132)
“双十二事变”·····	(140)
同爱德乐共进午餐·····	(142)
同处理与日本复交事务的联络官廖承志的 一次谈话·····	(145)
回首往事·····	(151)
革命博物馆·····	(157)
12月14日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	(162)
同邓颖超和康克清一起吃饭·····	(172)
北京协和医学院——现称首都医院·····	(182)
西长安街“居民委员会”·····	(186)
北京第三十一中学·····	(193)
中学“红卫兵”·····	(198)
小学“红小兵”·····	(204)
同一位共产党“老干部”的倾心交谈·····	(208)
北京东城区“五·七”干校·····	(214)
国棉三厂·····	(226)
北京市地毯总厂·····	(237)
艺术家与革命·····	(245)
人民大会堂·····	(255)
紫禁城内的展览·····	(258)
考古发掘出来的珍宝·····	(261)